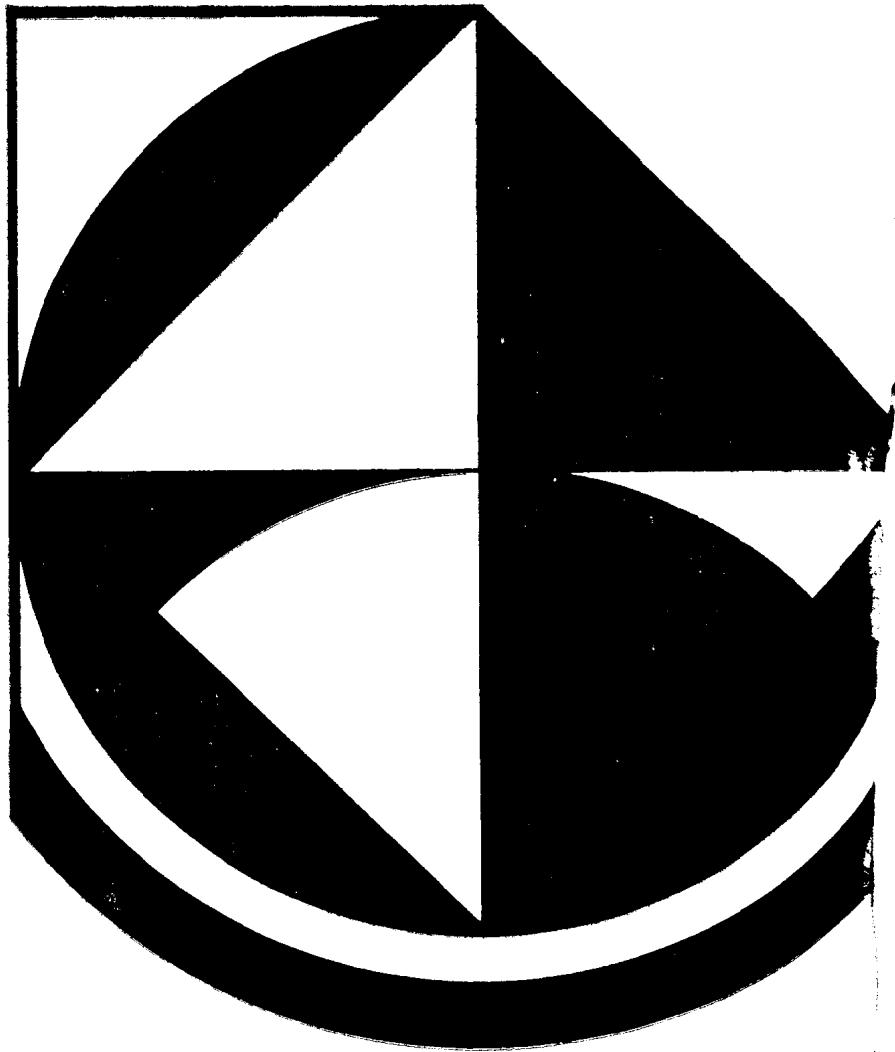


社会科学综述



第 1 辑

1987

与边缘学科研究

出版说明

由于我国“四化”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，广大科学研究人员、文化、教育工作者以及党、政有关领导机关，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。为此，本中心编辑《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》，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本专辑所收的资料，系按专题选编，照原报刊版面影印。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，一般不作改动（如有改动，当予注明），仅于每期编有目次，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，以资查阅；必要时附“编后记”，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。

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。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，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、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，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，概不收录。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、观点、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，甚至对立，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，对此，我们不急予置评，相信读者会予注意，能够鉴别。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“我国”、“中华民国”、“中央”之类的文字，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、国民党中央而言，不再一一注明，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为了统一装订规格，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，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，即封面倒装。

本专辑的编印，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，限于内部发行。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，慎勿丢失。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

社会科学综述与边缘学科研究（1）

—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（1987）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

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

建 章 选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市文津街七号）

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1/16开本 5 印张 128 千字

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 册

ISBN 7-5013-0038-0/C·1

（书号 3201·53） 定价 1.40元

〔内部发行〕

目 次

论“人文学”与“人文教育”	高 明	一
科学、技术、人文学	吴大猷	五
人文区位学概念的发展史略	周颜玲	1
*	*	*
启示文学与文化复兴	李 册	九
*	*	*
传播与政治发展	葛永光	一四
大众传播与社会运动	李祖琛	一八
*	*	*
亚美文化会议	吕俊甫	二一
社会科学将进入“中国世纪”	叶中敏	二二
*	*	*
广告学——一门仅有数十年历史的社会科学	蔡惠芳	二三
中国传统饮食观念的社会文化分析：以(元)贾铭 《饮食须知》为例	张 瑞	12
“二十年来我国行为科学的发展与展望”讨论会		25
“二次大战以后政治学发展的趋向”讨论会		39
现代人类危机及其反应	赵雅博	49

論「人文學」與「人文教育」

高明

周易賈卦（三三）彖傳說：「柔來而文剛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王弼注：「剛柔交錯，而成文焉，天之文也。止物不以威武，而以文明，人之文也。」「人文」這一名詞，見於中國典籍的，以此為始。從賈卦的彖傳來看，我們人類住在地上，看到天上陳列有日、月、星辰，從那些日、月、星辰的位置和變化，可以看出剛柔交錯的天文現象，因而察覺到那些天文現象，與地上人類相應的變化。由於日、月、星辰之間，是有磁場引力的感應的，他們的位置與變化，必然影響及於地球，直接的影響於地球自然生態的變化，間接的影響於地球上人類生理與心理的變化，所以說「觀乎天文」，可「以察時變」。至於「人文」，自是人類為著生存與生活，而創造出來的文化；人類創出文化，最明顯的就是要使人類和萬物都能過著和平安樂的日子；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認為我們棲止於和平安樂的日子是最幸福的，就努力於促使文化的昌明，以美化這個世界；所以說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」。

在西方世界的歷史上，有所謂中古時期的黑暗時代，那是神權至上，以神的文化控制一切的時代，為神的信仰不同而戰爭連年，人民生活困苦達於極點，因而激發了「文藝復興」（Renaissance）運動，而產生了「人文主義」（Humanism），希望從研究拉丁與希臘的古文獻中，擺脫神的文化控制，而回歸到人類自身問題的探討，提倡理性與自由思想的健全發展，這纔萌發了近代的哲學與科學，於是研究這種新文化的人被稱為「人文學者」（Humanists），而他們所研究的學科就被稱為「人文學」（Humanites）。

由近代進入現代，由於科技的飛躍發展，唯物思想大為流行。有些國家利用科技的優勢，從事物質的生產，造成了許多發大財的資本家，也造成了許多勞苦的勞動者，在國內社會上形成了階級的對立，製造出許多糾紛、鬥爭與仇恨；另一方面，經濟的先進國家向落後國家購買原料、銷售產品，致使富國日益富強，而貧國則日益貧弱，在國際社會上又形成了集團的對立，製造出許多糾紛、戰爭與仇恨；而同為富強國家，又為爭取原料供應地與產品銷售場，彼此鈎心鬥角，最後又常訴諸戰爭，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起來的。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，共產主義者以追求物質分配的均平為號召，利用世界上貧富不均的現象，在各國內部挑動起階級鬥爭，貧弱國家擋不住這浪潮，就常為共產黨徒所奪取，而擴大了共產主義集團的聲勢；富強國家看到形勢不妙，就趕緊實施社會福利政策，來緩和國內的階級鬥爭，但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不變，人人都祇知道拼命的賺錢，拼命的發展科技，無限制的生產，以求物質生活的改進，結果弄得遍地污染，自然生態遭受匱乏的威脅，給人類帶來了莫大的災害！同時在唯物思想的驅鑄下，拼命的發展物類的本能，拼命的放縱性慾，祇求物性的滿足，男女淫交，家庭不穩定，子女在缺乏親情下長大，結果弄得個性乖張，人情淡薄，嬉痞流氓，到處皆是，殺人搶劫，時有所聞，社會的病態叢生，色情的風氣泛濫，儼然是一個禽獸的世界！至於共產主義國家呢？控制在一些唯物思想之中，沒有絲毫的自由，常有餓餓的威脅，人已失去人生的意味，祇是一苟延殘喘而已；在那種環境中，人也祇好自視為物，甘作禽獸，沒有一

點自尊心，沒有一點榮譽感，完全變成一批無禮、無義、無廉、無恥的動物！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爭霸，彼此喧賓奪鶯，挑撥離間，劫奪搶殺，無所不用其極；而那些殘餘的神權國家的統治者，又在其中興風作浪，渾水摸魚，唯恐天下不亂，組織恐怖的團體，到處殺戮無辜，使得人心惶惶；於是核子戰爭、化學戰爭、雷射戰爭、星際戰爭，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，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恐懼，早已不脛而走。我們人類現在正生活在一個新的黑暗時代裏，那就是物的文化控制一切的黑暗時代！我們當前最迫切需要的，就是如何把我們人類（包括我們自己在內）從物的文化控制一切的黑暗深淵裏拯救出來。我們多方的思考，恐怕祇有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新的「文藝復興」運動（不是從拉丁、希臘的古典文獻中，而是從中國傳統的古典文獻中，重新體認「人文」的價值），建立新的「人文主義」（不僅發展我們人類的理性與自由思想，更要闡發我們人類的德性、慧命與內聖、外王之道），推廣新的「人文教育」（不僅傳播一些舊的教條，更要就現實問題，尤其有切膚之痛的問題，發聲振贖的詳加解說，使人由感性的領會、進入知性的領會，更進入德性的領會），是唯一可行的出路。

我認為：我們現代的「人文學者」，研究現實所需要的「人文學」，必須特別注意下列各點：第一，要把握「人本」的精神。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，就認為「人為萬物之靈」（見禹鑄），人是自己的主宰，既不應受鬼神的奴役，也不應為物欲所左右。詩經小雅說：「凡百君子，各敬爾身，胡不相畏？不畏于天。」（見雨無正篇）人祇要做好一個人，對人無愧，那看不見的天帝有甚麼可怕的。小雅又說：「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，喚咎背憎，職競由人。」（見十月之交篇）人類的災禍不是天帝降下來的，那是由於人與人間當面的紛呶、背面的憎惡，紛爭競逐所造成的。人類的問題，人類自己都可以解決，實在是無待於鬼神的。至於物欲，中國人總覺得「唯錢是愛」的是卑俗意識，「唯性是好」的是淫蕩意識，在心理上總是鄙視的，所以陶淵明貧困得要向人乞食，還不肯為五斗米折腰，極受中國人敬愛，而西門慶好色縱慾，卻落得喪身、敗家、絕嗣，還遭人唾罵。中國人總認為人類社會應該以人為本，既不是神的奴隸，也不做物的奴隸。第二，要體認「人生」的真理。

周易說：「生生之謂易。」（見繫辭傳下）人生於天地之間，究竟如何的去生呢？我們認為應該發揮「生命」的活力與潛能，應該力求「生存」的向上與延續，應該體認「生活」的意義與價值，應該瞭解「生計」的作用與分享，不僅如此，還應該培養活潑潑的「生機」，如程明道的時時看盆池裏所蓄養的小魚，自然也就生機活潑，而生氣盎然了；還應該培養蓬勃的「生意」，如周濂溪窗前草不除，他卻從這裏領悟到生意蓬勃，而養成他與自然同在，光風霽月的胸懷；更進一步，還應該培養樂陶陶的「生趣」，使人都好生、樂生，而使人類社會充滿了祥和與幸福。第三，要探索「人性」的根源。禮記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（見中庸篇），到底天賦與人的本性是怎樣呢？以前的學者有種種不同的看法，有的說「人性有善有惡」（世頤說，見論衡本性篇），有的說「人也無善無惡」（告不善說，見孟子告子篇），有的說「人性是傾向善的」（孟軻說，見孟子告子篇），有的說「人性是傾向惡的」（荀子說，見荀子性惡篇），有的說「人性無有不善」（莊周說，見莊子繕性篇），有的說「人性是善惡混的」（揚雄說，見法言修身篇），有的說「人性是分上中下三品的」（韓愈說，見溫陵先生集原性篇），而最後總覺得說人性本善，是具有良知、良能的，天賦本來是完美無缺的，容易使人具有「自尊心」，而恥於去為惡；總比說「祖先犯了過錯，自身是罪惡的種子」，或是說「前生作了孽，這世要來受苦難」，使人生來就有一種「自卑感」，而甘趨於下流，要好得多。所以我們中國人教小孩子，自幼就有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（見三字經）的觀念，深刻的印在腦子裏；以後長大，教他們為善去惡，就不難了。第四，要強調「人倫」的規範。人如果要「生」，便會發覺到人與人之間團結互助的力量，遠超過一個人孤獨奮鬥的力量。於是先由男女兩性的結合，發展而為父母與子女親情的結合，再發展而為兄弟姊妹相互提攜的結合，這就形成了家庭的倫理；由許多家庭再團結互助而成為民族、國家的社會，必須要有領袖（以前稱為「君」）、幹部（以前稱為「臣」）與群衆（以前稱為「民」）的組織（社區或政府）上下統屬，凝聚為一整體，這就形成了社會的倫理；社會上一些智慧優異的人，發明了許多有關生命、生存、生活、生計……等的道理與方法，而儲備了許多的智識與經驗，傳授給

別人，或是彼此觀摩學習，這又形成了師生、朋友之間的倫理。要使得各種倫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與美滿，就必須建立起各種倫理的規範。禮記禮運篇所謂「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義、婦聽、長惠、幼順、君仁、臣忠」，以及「講信、脩睦、尚辭讓、去爭奪」種種行為的規範，就因之而產生了。雖然各種規範或因時因地而略有不同，但是原本於對人的「愛」，則是絕無二致的。第五，要提高「人格」的境界。人不僅愛他自己，還要愛別的人，因為別的人也是「人」啊；人不僅愛與他親近的人，也要愛與他疏遠的人，正如禮運所說「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」，還應推己以及人，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」，甚至「矜（餬）寡廢疾者皆有所養」，必使天下人人皆能各得其所；這樣的不斷擴大人與人之間的「愛心」，造成一種祥和安樂的社會，使得人人皆不忍心去傷害別人、欺騙別人、忌嫉別人、殺戮別人，所謂罪惡自然消泯於無形了。要做到這樣，必須先提高「人格」的境界，在「人情」的敦厚、「人心」的瑩淨、「人品」的高卓、「人行」的善良、「人德」的完美……各方面積極的下一些工夫，從多種途徑去培養。這就涉及到所謂「人文學」的建立與充實的問題，以及「人文教育」的設施與推廣的問題了。

當前世界上的學術界，由於經濟建設的不斷成長，也由於科技戰爭的迫在眼前，對於科技人才的需求最為迫切，大多數的青年學者就一窩蜂的去探研科技，而政府對科技人才也大力的培植與獎勵，「人文學」與「人文學者」早就被冷落了！眼光比較遠大的人，看到現代的世界危機四伏，這纔慢然有所覺醒，覺察到「人文學」與「人文教育」不能再被忽略了，其重要性絕對不在科技的學術之下。但是科技的學術完全屬於「知性」的，而「人文學」，則兼具「感性」、「知性」與「德性」。如講「哲學」，就科技立場說，最重視的是宇宙論和知識論（或自然哲學與理則學）；就人文立場說，最重視的則是人生論（或人生哲學），而與人生有關的，如倫理學、道德學、文化哲學、藝術哲學等，以及其他涉及到價值論的各種哲學（討論真、善、美問題的各種學問），則均極為重視。此外，如溝通人類的情志，則有語言學與文字學的鑽研；如傳遞人類的經驗，則有圖書學與文獻學的鑽研；這些都希求其正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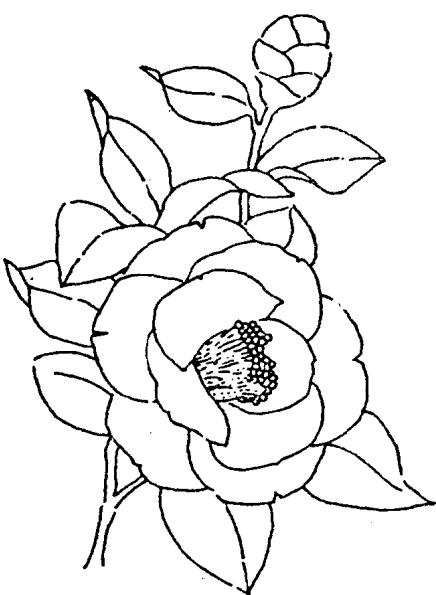
無訛，而達到求真的目標。如探研中國人道思想的發展，由講修、齊、治、平常道的「經學」，轉而為儒、法、名、墨……諸家的「子學」，又轉而為超、脫、寂、滅出世的「玄學」與「佛學」，更轉而為心、性、理、氣入世的「理學」與「心學」；又如探研世界人群社會的組成，就其構成的分子說，則有「民族學」；就其發展的歷程說，則有「歷史學」；就其政務的措施說，則有「政治學」；就其物資的運用說，則有「經濟學」；就其國際的肆應說，則有「外交學」；就其大眾的傳播說，則有「新聞學」；就其戰爭的攻守說，則有「軍事學」；就其集體的活動說，則有「社會學」……這種種學術都是為的修己而安人，其目標在「止於至善」。又如為抒寫人的情志，陶冶人的性靈，而有「文學」與「藝術」，包括「散文學」、「詩歌學」、「小說學」、「戲劇學」、「繪畫學」、「雕塑學」、「刺繡學」、「音樂學」、「舞蹈學」：等，希望藉助於美的形象、美的聲音、美的動作，來美化人群、美化社會、美化世界，而遠離醜陋與罪惡。總之，有關「人文」的各種學術，除了求「真」的各種科目，比較偏重於「知性」外，其餘則大多兼具「感性」或「德性」。所以實施「人文教育」，決不能專從「知性」著眼。

中國古代的教育，最重德性。周禮大司徒以「六德」（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）、「六行」（孝、友、睦、悌、任、恤）、「六藝」（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）教萬民；師氏以「三德」（至德以為道本、敏德以為行本、孝德以知逆惡）、「三行」（孝行以親父母、友行以尊賢良、順行以事師長）教國子；保氏則教國子以「六藝」（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）、「六儀」（祭祀之容、賓客之容、朝廷之容、喪紀之容、軍旅之容、車馬之容）；到了大學裏，受高等教育，則如禮記大學篇所說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于至善。」可以說國民教育（無論是平民的或貴族的）與高等教育都以培養「德性」為主，而培養「感性」與「知性」則次之。在科學制度推行以後，士子相率習文，以謀富貴，但同時卻有所謂「書院」以傳習人文，強調「德性」。即如宋初睢陽歐陽文、安定胡瑗、泰山孫復等，都以設書院講學，而轉移一代風氣，注意「人文教育」。我們祇看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教條，首列

五教之目（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），次列爲學之序（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），又次列修身之要（言忠信，行篤敬，懲忿窒慾，遷善改過），又次列處事之要（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），最後列接物之要（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），就可以知道書院的教育完全是「人文教育」。南宋還有一些書院，如婺州的麗澤書院、建寧府的建安書院、吉州的鷺洲書院以及象山書院、詠澤書院、龍溪書院、竹溪書院、環溪書院……等，教育方針都是大同小異。元朝是蒙古人統治的天下，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學術比較衰微的一代，但是全國竟有一百二十所書院，來傳授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實施「人文教育」。明清兩代相沿不絕，在社會上都會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力，我們試看黃宗羲所著的明儒學案和徐世昌所編的清儒學案，不難知道一些情況。直到清末，鑑於歐美的國富兵強，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奏擬學堂章程，纔有摹倣歐美的新式學校；光緒三十一年正式的廢科舉，設學部（即今日的教育部）；至於民國，新式學校已普遍設立，教育方針則漸由「德性教育」而轉向「知性教育」。自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（John Dewey）來華講學後，於是實用主義、經驗主義、工具主義的思想瀰漫於我教育界。現代是一個智識爆炸的時代，各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把心力灌注在科技新知的吸取與發明，講究「德性」的人文教育早就被置諸腦後了！可是社會上頻頻的發生種種不正常的現象，受過高等教育的常常出怪招、發謬論，而青少年頹廢墮落，幾乎無所不爲，殺人、放火、打鬥、姦淫、搶劫、詐騙等等的新聞，日見報紙，使人看得目顛心驚，大家這纔想起「人文教育」應該積極推行，不能再稍有忽略了。其實在美國這些社會不正常的現象早就存在，美國教育協會早就主張美國當前所需要的教育應是「均衡發展」的「全人教育」，該會的著名學者古勒特（J. L. Goodlad）在討論課程的改造時，就強調未來課程應該是「人文主義的課程」（Humanistic Curriculum），和我們中國過去「書院」的作法已大爲接近了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

至於「人文教育」應該如何推行呢？我認爲應該從幼稚教育、小學教育、中學教育紮根，而職業教育和社會教育影響最爲廣大，並不是大學教育所能單獨負擔的。但是大學是最高的學府，是各級教育機構所仰望的，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：第一，要對前述與「人文」有關的各種學科均能作深入的研究，並能作科際的整合，使高級知識分子對「人文學」的價值、體系都能有透闡的了解。第二，要使研究科技的人也都具有「人文學」的常識，另一方面也要使研究「人文學」的人具有一些現代科技的常識，從相輔相成中互求彼此的進步。第三，要建立起校園裏的人倫關係，使師生之間、同學之間、各社團之間充滿著愛的親和力。第四，校園內無論在教室、圖書館、博物館、實驗室、體育場、會議室、研究室、佈告處、禮堂、花園、走廊、宿舍、自修室、交誼廳……處處都顯出一種整齊、清潔、蓬勃奮發的生氣。第五，要使得校園內每一個人都能敦勵自己的人品，陶冶自己的人格，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，以真、善、美的素養，來造福於社會、國家，來造福於世界、人類。

（原載：台灣教育一九八六年四三七期 二七一三〇頁）



◎ 吳大猷

科學、技術、人文學

發展我國的應用科技，乃為我國圖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。相助，將永遠落後於他國。

吳大猷（圖刊載於中大學生報）



關於我國歷代的科學發展，最詳盡、有系統的敘述分析，當舉英人李約瑟 (Joseph Needham) 的巨著「中國的科學與文明」(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) (該書有七卷，分為九冊)。

首五卷已有中文譯本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) 該著評論我國歷代的科學思想、數學、天文、地學、物理學及技術工程、化學及技術發現、發明、生物學及技術、社會的背景等著者為生物化學家，於我國抗日戰爭期中，代表英國的 British Council 駐重慶，自駕一小型貨車遍訪我國諸後方多處，與我國學者交往。戰後返英，得二三位我國學者之助，從事上述鉅著之作。

李氏著中列舉我國許多技術的發明（如磁針、水車、風箱、造紙、印刷、火藥、「沖天炮」……等），有些早於西歐數世紀的。李氏對我國文明科技，無疑是喜愛同情的，有些國人多引李氏的書，為我國古代的科學高於西歐的明證，以為我國的科學落後西歐，祇是近三百年的事，這個觀點，一部分是源於為國家民族「爭光」的心理，主要的是源於未將「科學」、「技術」的要義區分。

有發明而無科學的原因

我國民族，確有無數的「發明」（如上舉的例），且有貢獻於人類文明的重大發明（如造紙、印刷等）；亦有許多觀察、記錄（如星宿、日月鉗、季節、草木、植物等）。在科學方面，有早在西元前一千年的「商高」定理（早於數百年後希臘的畢氏定理）；「墨子」書中有凸凹鏡影像的觀察敘述；有秤的力矩的敘述。我們對磁石磁針的性質（甚至如傾斜角）有許多觀察的敘述；在代數上有頗高的成果。我們可以舉出更多的發現、觀察和敘述。

由李氏的畫，我們可獲得一總結論，即是我們的發明，多係技術性、實用性的；我們有敏銳的觀察，有解答問題的智力。但我們似弱於抽象的思索和假設、邏輯的、分析的、演繹的研究。這些正是「純粹科學」的要義。我們有許多機械性的發明，而從來未曾接

近到抽象的廣義的力學原理的思考；我們有甚完善的一幾何光學」的敘述，而從未會有「光波」的觀念，故亦未會有波動光學；我們

有高定理和若干實用問題的幾何，而無公設式的邏輯演繹的純粹幾何學；我們有磁石磁鐵的觀察及應用，而從未會接觸到磁力作用定律的測定。我們有個別性的「技術」和「發明」，但我們未曾發展它們成為「科學」——基礎性，一般性的思想觀念系統。

我們有許多重大發明而未有科學，主要原因是我們文明受儒家思想的影響。儒家的中心思想，是倫理，是人與人，人與社會的關係，是和這有關聯的個人的修養。我們的「哲學」，一般言之，是偏重「實用」的，故我們民族本身沒有其他民族的激烈宗教觀念，亦弱於西方的哲學思想系統。

第一因素，可能是我們從未發展了科學術語——符號——的運用。西方數學的進展，由符號，方程式，的引入而突然猛進。符號係邏輯思維的基本工具。我國的文言敘述，使科學研究結果的傳達，極為困難。一個數學家研究所得，往往埋沒於著述中。這是我們典籍中有個別的科學結果，而少前後人繼續性的發展的原因。

自明代建立以科舉取士的制度，明清兩代的科學，更受壓抑。到了清末，我國和西方接觸經一串的敗績後，以為我們底是機械不如人，乃驛艦，建兵工廠，鋼鐵廠，造船廠，並作「中國為體，西學為用」之說。我國接受了西方物質文明的表面，但不知機械兵器之下，還有「科學」的基礎。及至民國，國人漸有習科學者，知西方物質文明，乃建在科學基礎上的。乃於我國學校中引入基本科學課程，如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等，開始啟蒙學習的時期。到了民國十年年代，我國在外習科學的返國增多，地質學的丁文江、翁文灝、李四光；數學的姜立夫、熊慶珠、孫唐；物理學的胡剛復、饒秉泰、葉企孫、吳有訓；生物學的秉志、胡先驥；氣象學的竺可楨；化學的吳憲、侯德榜、邱宗岳；土木工程的茅以升；語言學

的趙元任；考古學的李濟等；這祇是筆者所知的或記憶所及的。這些位可稱為我國新科學的第一代：他們於倡導科學，培育第二代的科學人員的貢獻至大。

開始進展的科學研究

國民政府成立後，大局漸定。民國十七年設立中央研究院，在三所大學中，科學研究亦開始萌芽。地質學，包括古生物學，尤其著有成績。不幸的，抗日戰爭於民國廿六年展開，政府及大部學術人員輾轉內遷後方。科學人員在既無設備，又時在空襲警報及物價日漲情形下，研究工作，乃不絕如縫了。

在民國二十、三十的兩個變亂頻仍年代中，我國仍培育了些青年學生，為我國留外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科學人員，其最著者如數學的陳省身、華羅庚；物理學的楊振寧、李政道、林家翹、吳健雄；化學的李卓皓、王瑞麟等。

民國卅四年抗日勝利，政府及人民，未遑喘息，共黨竄起，政府遷臺。民國四十年代，在人力財力均缺的情形下，高等教育已難維持合理的水準，科學發展，更遑論矣。民國四十八年，由於胡適之先生及作者的倡議，政府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，然限於財力人力。五十六年先總統蔣公決發展科學，於國家安全會議下設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，於行政院下設立國家科學委員會，分別從事政策及執行工作，十五年來，從事科學教育科學研究設備環境的建立，人才的延聚培植；經費年約四億元，近數年略增。目前多數的大學及研究機構，教學研究設備的水準，遠勝於抗戰前在大陸時；受有高層訓練的各部門科學的研教人數，亦遠超過在大陸時。我們的科學研究，有些開始達到國際水準，且間有斬頭角的。我們可以說是已有了科學發展的起步所需的基礎。

回顧我們由改善大學教學設備環境，延聚教師，從事研究工作，訓練學生，培植高層的研教人員，為時廿年，始達到目前的開始進展階段。發展科學，研究及培育領導，皆需人才，而培育人才則正如常語「百年樹人」，不若購置設備的即日可致也。



必須著重研究與發展

我們無需申述科學技術在工業、農業、國防上的基本重要性。以工業言，在國際上的強烈競爭下，沒有高度科技為基礎的工業，是甚難生存的，故問題是如何的增強我們某些科技。

我們熟聞「技術引進」、「技術轉移」等術語。這是指以某種代價方式，購買他國的製造生產技術。這不僅是科技落後的國家宜採的途徑，即科技及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如美國及日本，仍有互作「技術引進」的情形。我們近年來的電子工業，即是藉技術引進建立的。但如我們祇作技術引進，則我們將永在人後，不能與人競爭的，故在工業中，必須作「研究」與「發展」。所謂「研究」，乃求新產品，產品性能的改進，新技術的研究；所謂「發展」，乃將上述研究的結果，作小型實施生產的試驗。「研究與發展」包括應用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生產成本等各項研究分析過程，故須有這些方面的專才，不是沒有良好科技訓練的一般技工所能勝任的。我們發展工業的初步，自須引進技術，但為求工業能繼續生存，則必須繼之以「研究與發展」；如謀「工業升級」，則「研究與發展」更是絕對必需的。從事「研究與發展」的基本要素，是應用科學及技術的人才。

「培育科技人才」一詞，也是我們熟聞的。這幾個簡單的字，涵義卻不簡單。「科技」是「科學」和「技術」的簡稱；如說國家的政策是「發展科技」，則意應指純粹科學、應用科學和技術；如說的是發展某些工業的科技，則意是指該工業所需的應用科學和技術。次言「人才」二字的意義。每部門的純粹科學人才、應用科學人才、技術人才自然皆各有等級。例如一個優秀的應用科學家，是有良好的基礎科學訓練，有分析解答新的具體的問題的能力的人。以電子工業為例，它的「研究與發展」，是需要在半導體物理有瞭解的應用電子學家，成熟諸電子技術的固態物理學家，他們都應有量子力學的基礎，才能瞭解固態物理、半導體的原理。有這些的知識，才能希望在電子工業的「研究與發展」上有所創建。這是「人」

才」二字所應指的意義。我們在清楚的明白了「科」、「技」、「人才」的意義後，便容易明白「培育」二字的意義了。仍以電子工業的「研究與發展」所需的人才為例，顯然的我們需要大學畢業或研究生的訓練作起點。無論他是電機系、電子工程系或物理系畢業的，都應對固態物理、量子力學（自然的先有電磁學、近代物理等基礎知識）有適當的知識。有這些基礎的訓練，再經研究工作的經驗，始成一個成熟的電子專家。

上述對「人才」、「科技」、「培育」的解釋，似建立過高過嚴的水準。但這正是一個工業成敗的關鍵所在。日本電子工業、汽車工業，發展遠後於美國，而近者不祇可與美國抗衡，且超越之。我們切勿誤以為日本的產品以價廉取勝；日本的電子產品及汽車，是以「質」致勝的。「價」可以削減，「質」則是應用科學和技術的成果，不能倣效的。

明確的認識問題之所在

發展科技和培育科技人才的重要，是無疑義的。

我們再回到「科技」一詞中「科」所包含的純粹科學部分。我們已申述技術、應用科學和純粹科學的分別和三者間的密切關係：如欲強以樹比擬，則技術如花果，應用科學略如枝葉，純粹科學則略如根；忽視基礎的純粹科學而輕視應用科學的重大進展，亦猶使根枯萎而望花繁茂的不可能也。故即從實用的觀點而發展科學，亦不能偏廢純粹科學。這個道理甚明，是無容爭辯的。從人類求知求真理的觀點，純粹科學自然不能荒棄。頗見「充應發展純粹科學抑應用科技」一類的爭論，是由於未明二者的關係的偏見。有意義的問題，毋寧是：在某一個國家在某一個社會經濟情形下，於二者發展的致力宜作何比例。以我國目前情形言，給予這比例一個數字，應是經許多因素的分析瞭解後，而作的一個主觀性的政策性的決定，沒有絕對的答案的。

至若發展純粹科學，則有較一般性的途徑，純粹科學的探索，需要自由的環境，如大學和學府性的研究所等。最重要的是「人」

——忠誠於求知求眞理的、博知的、深思的、有想像力的學者和青年，和由這些「人」所造成的學術研究氣氛。科學研究，自然需要設備及經費。但我們往往致大力於有形的物質環境設備，以為樓舍、儀器、圖書、人員及經費，即構成「科學」，未知「人」及研究工作，「量」之外，尚有「質」的級別。

我國科學近年來確有顯著的進步，如各大學的教學及研究設備，教師教學水準，研究人員及工作的量和質，皆不是廿年前的情形可比擬的。但有若干情形，近年來有日加嚴重的趨勢，茲略舉一些問題，它們的來由和改善的議論如下：

一、由於社會經濟繁榮，急利風尚，影響所及，使青年①多偏向應用科學。②低減學術上的求知、求瞭解的志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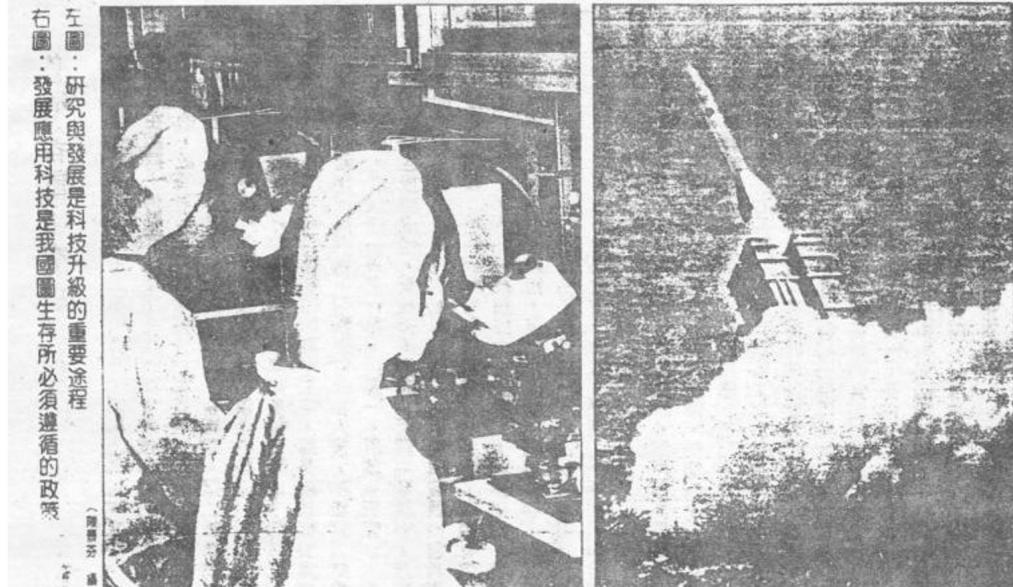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由於我們的大學研究所的研究水準，教育部對高級學位的規制，社會的傳統觀念許多因素，使我國的大學畢業生多出國及外留。這是我們高級科學（包括純粹及應用科學）研究工作及人才培植進步緩慢的基本原因。

三、政府雖屢申「發展科技，培育人才」的政策原則，但似對我國的高級（純粹及應用）科學研究及人才的實況和問題，未有深切的認識，和改善這些情形的基本性具體性的措施。

四、改善上述的一些情形的首步，是明確的認識問題之所在。

例如「培育人才」，我們首須對我們的「人才」的量和質有清晰的評估；次須訓練和培育某水準人才的確切方案；更須有執行的機構和人事。這是最淺顯的道理，但亦正是我們往往忽視的。發展我國科技，培育人才，目前的首著，是由「政策原則」階段，邁入上述的步驟。

圖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



左圖：研究與發展是科技升級的重要途徑
右圖：發展應用科技是我國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

發展我國的應用科技，乃為我國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政策。於純粹科學的致力，可佔極小比重，但不可偏廢。一個沒有純粹科學的國家，它的科技人才的訓練，亦將依賴外國，它將永是落後的。

（本文承蒙吳大猷先生同意，摘錄自吳先生所撰「科學、技術、人文學」一文，特此致謝。）

啓示文學與文化復興

李冊

啟示文學與文化復興

現今是個科學發達、文學繁盛的時代。在這科學主導人生的時代裡，如果能藉文學的修習與意境之提昇化導我們的日常生活，想必是更能豐碩我們「科學的人生」。

在文學領域裡，曾經影響西方文壇一千多年的所謂「聖經文學」，可以說是一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學派。換言之，西方歷來許許多多大文豪妙筆底下的世界，莫不與「聖經文學」裡的人物、題材與意境有著密切的關係。我們如果理解了它的時代背景、人物造型與故事情節，可能有助於瞭解西洋近代以來一些墨客騷人筆觸下的文學結構。

如前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以色列詩人以撒·辛格，他的寫作之靈感，就多半是源自聖經文學的。有感於此，筆者試想探討「聖經（啟示）文學」的語意對現代人的一些啟示，進而本我博大悠久的文化特質，融攝這所謂外來的文化思潮，以堅實我以仁易暴、以愛制恨的心理基礎。

德人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7 ~ 1976 的用語）。有了這一先決的條件，再加上對於聖經文學用語本身的關切，常思考、多切心研究，以找出個中文脈義理相通的所在——即找出文字語言前後左右有「伴偶」（參以賽亞書卅四：16）的地方——是則，有關這方面的知識，就會漸次增長（參但以理書十二：4）。這種研究的入門法，外觀看來委實很像海德格所從事的現象學—詮釋學的手法。

海德格一生想理解「存有」（Sein）這個基本問題的意義，而考究出唯有以人的存在於世（他叫做「此有」Dasein），作為首先與「存有」發生關係的「存有者」，才是一切「理解」作用的原始基礎。這也就是說，凡想研究、思考與理解「存有」的意義，就要從分析、理解「此有」本身著手起。能夠對「此有」作存在分析以照明「此有」，那麼，才可以把握人的「循環的存有」的意義。海德格這種方法，終被人評為係視「存有問題」為「存有根據」的循環毛病，只是他並不以為恥，反而指出：我們「當如何的跳進這個圈子之中」為關鍵，來質詢提出這樣詰難他的為學方法的人。

首先，筆者在此想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就宗教範疇與意義而言，聖經文學語言所表明的「真理」多稱作「靈界的真理」。然而，這並不表示，所謂的「靈界的真理」全不可解，全不可悟。作為現象界之人，要進入真理的堂奧，乃是有其門路的。這個門路，係繫於有心研究之人對自己心靈豁然的開放（猶若當代西方存在主義思想大師之一——

聖經文學語言表明的「真理」之分析與應用

1 解釋經言用語之道

首先，筆者在此想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就宗教範疇與意義而言，聖經文學語言所表明的「真理」多稱作「靈界的真理」。然而，這並不表示，所謂的「靈界的真理」全不可解，全不可悟。作為現象界之人，要進入真理的堂奧，乃是有其門路的。這個門路，係繫於有心研究之

2 兩則聖經文學語言的分析與應用

話說，既然所討論的是靈界的真理，則聖經文學用語的精神所在

·就是指涉著這一方領域。只是，這種「真理」切不可與科學所把握到的科學的真理、現象界的真理混亂。像梯立希（Paul Tillich 1886 ~ 1965）就分辨出、指示出了「科學真理」的意涵：「……科學或許可以給予美，它當然沒有給予真理。倫理學或許會幫助我們獲得美好的生活，它可無法幫助我們得到真理。宗教或許會令人產生深摯的情感，但它不會聲稱有「真理」。只有科學才給予我們「真理」——它給予我們嶄新的灼見，以洞觀宇宙大自然運行的循序，以洞觀人類歷史的結構，並洞觀人類心理隱蔽的事物。它給予人們一絲喜悅之情而不遜於其他的喜樂。凡從幽晦、靈暗到知識劇烈的亮麗中，體驗過了這層轉變的，就始終會禮讚科學的知識與真理……」（引自拙譯梯著：「新存有」）。然而，所謂真正的「（靈界）真理」，用聖經的話說，是可以叫人獲得智慧、重獲生命與重獲自由的（參約翰福音八：32）。基於這層觀點，筆者試想舉出兩個例子，以作為我們了解主觀自己的處境和客觀局外世界的演變的參考：

(1) 在新約馬太福音中提到所謂人類「大災難」的徵兆是這樣子的記載：「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，總不要驚慌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。……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多處必有饑荒、地震。這都是災難的起頭。……那時，必有許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、彼此恨惡。……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，那行毀壞可怕的，站在聖地（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）。……因為那時，必有大災難，從世界的起頭，直到如今，沒有這樣的災難，後來也必沒有。」（太廿四：6 ~ 21）

釋：就這段經文的描述，筆者認為，可與我們當前瞬息的世界的演變，有極深的雷同之處：

(A) 目前世界的情勢，可謂動盪不定，像內亂與外患的戰禍情況。

真可說是到處層出不窮。世界無論貧窮地區或戰亂地區，發生餓殍遍野的景象常令人不忍卒睹。而且，不時的小地震，亦交相而來侵襲人類可愛的家園。唯聖經示言，我們的相應之道乃為：「總不要驚慌！」。這可與我先總統蔣公曾提示國人，一旦面臨了橫逆與艱困的國際處境之時，要以「莊敬自強、處變不驚」沈著的、冷靜的應變態度對待之，誠有前後輝映、一脈相通之妙。

(B) 新約的作者，引用了舊約先知但以理所說的「那行毀壞可怕的，站在聖地」一語，而特別提醒研讀此經文的人會意，當可見其中委實蘊含著極重要的玄機。我們如果翻閱但以理書，可以看到它對那「行毀壞可怕的，站在聖地」者所作的特徵之描述，有極顯明的輪廓與清晰的形象：

(a) 「他漸漸强大，自高自大……以為高及天象之君，……毀壞君的聖所，……他將真理拋在地上……。」（但八：10 ~ 12）

(b) 「犯法的人罪惡滿盈，……面貌兇惡，能用雙關的詐語。他的權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毀滅，……任意而行。……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，心理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，毀滅多人，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，至終却非因人手而滅亡（但八：23 ~ 25）。……你要明白，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異象（17節）……，關乎末後的定期（19節）……，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（26節）。」

(c) 「那行毀壞可怕的（原文作：使地荒涼的）如飛而來，並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（原文或作：傾在那荒涼之地），直到所定的結局（但九：27節）。」

(d) 「必有一個卑鄙的人興起接續為王，人未曾將國的尊榮給他，他却趁人坦然無備的時候，用誑媚的話得國。……與這君結盟之後，

他必行詭詐，因為他必上來以微小之軍（原文作：民）成爲強盛，趁人坦然無備的時候，他必來到國中極肥美之地，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會行的，將擄物、掠物和財寶散給衆人。又要設計攻打保障，然而這都是暫時的（但十一：21～24）。

(e)「作惡違背聖約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。……他必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超過所有的神，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。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忿怒完畢，因爲所定的事，必然成就。他必不顧列祖的神，也不顧婦女所羨慕的神，無論何神他都不顧，因爲他必自大，高過一切。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，用金銀寶石、和可愛之物，敬奉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。……凡承認他的，他必將榮耀加給他們，使他們管轄許多人，又爲賄賂分地與他們（但十二：32～39）。……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，設立他如宮殿的帳幕，然而到了他的結局，必無人幫助他（45節）。

以上是又稱爲舊約啟示錄——即但以理書——對那卑鄙邪惡、施行毀壞之「人」的特徵的描述。而，在此，筆者乃要慎重指出的是：以上所列，聖經原文記載所發生的時代背景，雖是在遙遠的西元前的以色列人的歷史時代，但基於聖經思想一再顯示出人類歷史廣闊的觀點——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，已有的事，後必再有；已行的事，後必再行」（參傳道書一：9）以及「按正意分解眞理的道」（參提摩太后書二：15），乃是「以經解經」的根本原則，其目的本是要將「奧秘發明出來」（參歌羅西書四：4），而讓有心者知所惕勵——故而，就經文所述，衡度時勢，那施行毀壞，眼中無神的「人」，以現今的觀點看來，幾可說是：高抬自己、超過一切稱爲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（亦指：人的心）裡，自稱是「神」的人、集團、思想或制度（參帖撒羅書一：3～4）。

又，聖經文學最爲珍貴的戒示，就在這兒——指出最後人類能以勝過這場大災難的因應之道：必須「自己清淨潔白、被熬煉」作明白人（如：明白上天意旨、國際局勢之演變……等的智慧者），並等候結局，以致終可永遠安歇、享福（但十二：10～13）。讀者諸君，您有何看法？

(2) 在新約啟示錄裡提到一匹「紅馬」的記載是這樣子的：「揭開第二印的時候，……就另有一匹馬出來，是紅的，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，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殺。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。……揭開第三印的時候，……見有一匹黑馬，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。我聽見……似乎有聲音說，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，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、油和酒不可糟蹋……。」（啟六：3～6）

釋：對此文中所載「紅馬」一詞，在舊約的撒迦利亞書中，也出現過數次：「……夜間觀看，見一人騎着紅馬，站在窪地、番石榴樹中間，在他身後，又有紅馬……。我要指示你這是什麼意思。那站在番石榴樹中間的人說，這是奉耶和華差遣，在「遍地走來走去的」。那些騎馬的，對站在番石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說，「我們已在遍地走來走去，見全地都安息平靜」（亞一：8～11）。……我又舉目觀看，見有四輛馬車……第一輛車套着紅馬，第二輛車套着黑馬，第三輛車套着白馬，第四輛車套着有斑點的壯馬。……這是天的四風，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。套着黑馬的車往北方去，白馬跟隨在後。……你們只管在遍地走來走去，他們就照樣行了。……看哪！往北方去的，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。」（亞六：1～8）

我們如果把聖經預言文學之語言，解釋成現今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而予以應用，似乎便不難瞭解它的理趣。像以上所述，有的解經家即認爲，在啟示錄第六章所敘述的四印，目的是在所謂「大災難」

的起頭，為叫醒世人的迷妄而恩威並行的作為。白馬的特徵是：「騎在馬上的拿着弓，並有冠冕賜給他，他便出來，勝了又要勝。」（啟六：2），這象徵着恩典的到來以及正義永戰勝一切，我們站在「義」的一方、「善」的一方，現在打了勝仗將來還要打勝仗之意。紅馬的特徵是：專司殺戮的工具，為禦世人安和的暴虐專制獨裁集團，它將來是啟動世界大戰的創子手。黑馬的象徵是：繼紅馬之出現而原不起眼的「東西」（或作黑金石油、或作阿拉伯產油諸國解）亦告崛起，顯示了暴虐專制政權之集團影響所及，連人們物質的滿足與精神的需求，都遭受前所未有的缺憾與戕害（顯示普遍性的世界經濟危機之景況）。而除非跟隨「白馬」前進，則無法使祂安心；這又另有宗教象徵，恕在此不贅。

以上是經由舊、新約經文的排比、對照，找出其「伴偶」（參前所述）之所在而為文的。筆者在此誠然不想添加什麼，只是想指出其「奧妙」之處，以供我們考究其文義脈絡，對當代之人所想要顯示出來的「靈意」究竟是指謂着什麼的參考。在此，恕筆者提出一些不成熟意見以就教賢明的讀者：

它難道是：「單」指着過去某一民族、在某一朝代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累積記載嗎？
還是：為了「長他人志氣而滅自己威風」、「正難敵鬪邪」所作令人消極、失志與懼敵的陳述？

還是：它根本就是一部「西方人」的聖經，區區只是一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軼事、宗教神話而不足我們加以採信的「無稽之談」？還是：人類當今及未來的歷史發展（包括過去與現在的歷史演變之軌跡），根本不「幻想的」聖經文學語言所能含蓋的與把握的，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，原就是朝向那未知的領域（藉着人類試誤的基本

式，所累積下寶貴的經驗而歸納出一套人類歷史發展的模式）探討邁進；僅凡人類所作所為、所思所計者，當然是要走向建立一個康莊的未來、福祉的未來、安和的未來，而不似聖經所載那般駭人的，全面的即將要（甚至已發生或正發生）在我們目前的社會、邦國、世界中出現的可怖情景？

還是：一個以色列的區區歷史記載，怎可影響、預言到、甚至左右着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，難道不知道包括我國在內世界各國也有她自己的智慧者、先覺者之訓示與預言，有她自個兒的論究人類未來命運之神話、宗教、哲學的世界觀、宇宙觀與歷史觀？還是：故意對本經文的穿鑿附會，強意解說，張冠李戴，截頭補尾，斷章取義而裁製成一套漏洞百出、破綻橫生的所謂的「應驗文學」與「文學神話」？

還是：著意侮蔑那些為自由、為真理、為人類和平奮鬥的人士所付出的血汗代價，而恣意解消我們為爭人類自由和平與福祉所從事的努力？

還是：不顧世界現狀詭譎的發展，不顧我們目前國家的需要與發展，危言聳聽，妖言惑眾以沽名釣譽？

還是：削弱我們抗敵的心理防線，讓敵人有機可乘而不知積極奮鬥，光是耽溺於預言的海市蜃樓、虛無飄渺的「歷史應驗」之汪洋中？

還是：根本不明白當前政治舞臺上現實的權術政治所扮演的基本

角色，而硬以空泛理想的道德、宗教教條來統御、束縛，甚至篡改人類既成的歷史結構與發展模式？

還是：根本不清楚我國偉大的政治、道德思想家——孔子以來，諸先聖先賢承繼諸先聖先賢的道統，所致力發展的世界理想的政治型態與模式，而硬把「政治」扯上尚有待證實（科學檢證其真實存在之價值）之宗教歷史哲學的理論架構，與宗教有關人類行為模式、社會演化及國家權力嬗遞演變的種種揣測及表象式、神話式的描述？

還是：聖經根本就是一部偽書，其中所載的多是前後自相矛盾、語無倫次與子虛烏有的事，而却想極力替它自圓其說，付予它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、時代價值和留傳青史的存在意義？這乃是一種夢想？！

還是：如同實證主義者孔德（A. Comte 1798 ~ 1857 去人，社會學家）之人所言，宗教之產生雖是人類社會歷史文化之發展必有的現象，只是它早已過時，因為人類的社會歷史之演化，確是從神學（神話、宗教）階段，演進到玄學（哲學、思辯）階段，如今亦已進化到科學（實證、檢證）的階段。僅凡有關神學與玄學的形而上學思想，對於受過現今科學的薰陶與教養的人士而論，根本毫無意義且毫無價值可言。所以神話、玄學的廢話「理」當予以唾棄，不然，就是一種對洞窟之蔽、市場之蔽、劇場之蔽和種族之蔽（培根 F. Bacon 1561 ~ 1626 英人，實證哲學創始者之用語）之集其大成的執着與「圖騰崇拜」？！

建議：賦予聖經文學思想應有的評價，益而宏揚我中華博大文化化的藝術精神。

總括以上所述，筆者撰述本文的一貫宗旨，是懇切的希望有識之士能以辨明，所謂「宗教」（基督教）之能以自由存在於自由世界乃是它們的時代意義與重要性的。尤其，正值我國為復興我中華五千年

國所應具有的風範，多包容、多吸取外來思想及文化的精髓，以堅實強化我博大文化的實質內涵。

但願我們有此一「共識」，進而多方設法，為中華博大悠久的文化之得以宏揚於世而努力、而貢獻！！

（原載：哲學與文化〔台〕一九八六年

二三卷 七 期六七—七二頁）

（上接第二二二頁）

者相當困窘。
此次會議予人一個印象，就是主辦者有意促進海峽兩岸知識分子的接觸。我個人的觀察，也肯定了此印象。這種接觸自然有人從負面去評估；但這次的經驗，使我覺得這種接觸的正面價值多於負面價值。由於這次與會者，絕大多數均曾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，他們的事業成就和在會議中的傑出表現，無疑給每一位與會者（包括來自大陸者）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。這個深刻印象所能產生的意義是甚麼？我想明智的讀者自然知道，不待我來贅述。正如華航事件和國際運動場上的兩岸接觸，這種經驗不見得全是無益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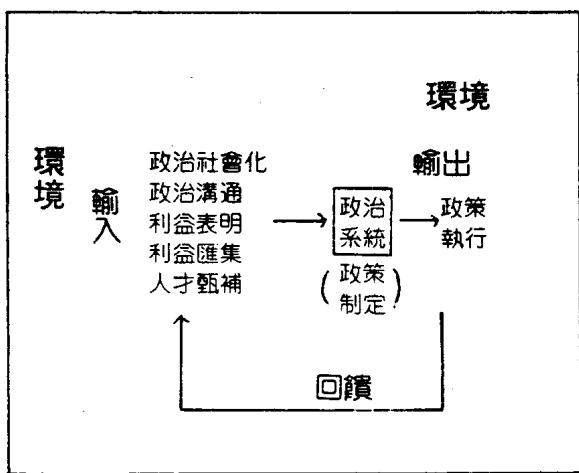
亞美文化協會雖係初創，但從此次會議的成功看來，我個人的感覺是：如果該協會能長期保持現有的熱忱，並不斷循理性的途徑發展，則該協會勢將成為亞裔民族在美國一股不可侮的力量。

（原載：明報月刊〔港〕一九八六年

傳播與政治發展

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出現，對這些新興的國家而言，面臨的一項艱鉅的任務：就是如何在國家建立的初期，很快的建立起一般民眾對國家的認同，及如何將國境內的民眾整合起來，從事於現代化的建設工作。研究政治發展的學者，常常從功能的理論來看，認為任何一個政治體系都履行著類似的功能，輸入的功能中包括政治社會化、政治溝通、利益匯集、利益表明、人才甄補等政策，然後還要經過一回饋的過程，重新再輸入到政治體系中，我們可以下列簡單的圖表示：

「傳播」影響日鉅



但是，隨著科技的進步，傳播媒介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，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，傳播媒介的影響無遠弗屆，許多原先是由政治系統

中其他機構所履行的功能，已逐漸有為傳播媒介所取代的趨向，換言之，傳播媒介的影響力愈來愈大，傳播媒介不但在履行政治社會化、政治溝通、利益表明、利益匯集、人才甄補等輸入功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甚而對政策制定、執行，及反饋等工作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因此，一個社會無論是在傳統階段抑或是在現代化的階段，傳播媒介的重要性均不言可喻；誇張一點的說，一國之興亡成敗幾乎與傳播媒介是否正確的履行其功能，息息相關。

研究發展的學者，都很重視環境對發展的影響，環境可分為兩種：內環境與外環境。前面我們主要是從內環境的觀點來討論，另外我們仍需從外環境的觀點來看傳播與發展的關係。這方面的討論就可從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來探討，究竟國際傳播體系對開發中國家的傳播內容，以及其發展有何影響。